



对照记——论都市书写的“镜像”式观照

葛 亮

摘 要：香港与上海因其在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紧密联系进入学术批评视野。李碧华、黄碧云与王安忆等沪港两地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清晰地表达了两座城市在文本中“镜像”式的互涉关系。近年文化界兴起的“老上海”风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港制造”。出产于香港的“上海怀旧”以“精神还乡”的形式，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关键词：“城市性”；上海/香港；“镜像”式互涉

近年来，评论界言及“城市性”问题，有两座城市因其在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紧密联系，且在文化质量方面可观的相似性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即香港与上海。由于其城市品格的复合性与其在文化质量上的定位，沪港之间的比较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李欧梵教授的《双城记》提供了一种思路，以近现代期间沪港的政治文化格局来考察二者互为“他者”的联系。而在当代语境下，这种联系是一成未变还是另有拓展，给予我们相当大的思考空间。两地作家的城市书写，则为我们呈现了文学文本分析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曾经在《论那喀索斯主义》(“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一文中，指明了主体与他者的肯定性关系，即镜像作为同一性幻觉的存在^①。可以得到印证的是，上海在历史文化场域中，对香港所寄予的“镜像”意识，亦颇具渊源。早在1927年，鲁迅在《再谈香港》一文中，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香港的政治格局：“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乐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②。而这与其对上海租界的印象，如出一辙^③。杨刚(1905—1957)于1938年发表的《上海写给香港——孤岛通讯》，则以拟人化的手法，实现了二者的直接对话，将这种意识具象化了。

香港老哥：我们还未认真请教过。我想你一定不会嫌我唐突吧。实在的，我们原有一点亲。新近我家里又有不少人走去打扰你，并承你大量宽宏的容纳招待，不让他们的手空也不令他们的笔闲着，这是合乎我的意思，他们都应该更忙一些，我谢谢你。

我们还是有一点亲，恐怕你还没想到这一点，我却老早知道了。我是半殖民地，你是殖民地，你在一个主人的脚下睡觉，我在几个半主人的手下撑持。我苦

① 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1966, 14; pp. 83—84.

② 鲁迅：《再谈香港》，载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

③ 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一文中写道：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参见鲁迅：《现今的新文学概观》，载鲁迅：《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32页。

得很,我也精神得利害。过去是不用说它了^①。

“亲”指明了其中的同一性关系,而“孤岛”意象正指代了“镜像”的实质。这段话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将沪港两地彼此关联。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二者在殖民势力侵入下经历了相似命运(也正是相较于中国其它城市的“他性”之根本所在)。此文亦指出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历史事实:大批沪籍文化人南下,给香港带来了新鲜空气,香港成为战时文化中心^②。其中,茅盾等作家在1938—1941年的抵港标志着第一个南来潮,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立了两个组织——全国抵抗组织香港分部(1938—1941)与中国文化协会(1939—1941)——以此来推动文学活动和散发抗日传单^③。而香港文化界亦因此开端了“上海化”过程。

同时,这封《孤岛通讯》却在篇末以上海的口吻对香港的境遇进行了判断:“我看我似乎比你有福气一些”。因为“刺激,劳苦,困乏,兴奋,激愤天天换着花样鞭策我”^④。这是当时的上海文化界较为普遍的观念,也是掺杂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道德优越感的呈现。

这种优越感在张爱玲(1920—1995)的笔下则表现得更为明晰确定。张将香港定义为殖民者观照下的客体,以一味奉迎的姿态扮演着“寡廉鲜耻”的角色,试图呈现给“英国人”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⑤。

在香港生活逾5年^⑥的张爱玲,对这座城市有着可触可感的认识。观察其对香港的书写策略,会发觉其在叙事中频繁地模仿殖民者的限知视角,对城市进行物化呈现,反讽的意味不言自明。然而,张主观上则同时凸显了自己作为上海人的注视。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的表白几乎是宣言式的:“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⑦以上表述的吊诡之处在于,“上海”对“香港”的优势以殖民情境中的民族主体意识为指归。李欧梵解释为:对张爱玲来说,当香港在令人无望地全盘西化的同时,上海带着她所有的异域气息却仍然是中国的^⑧。而当张爱玲将之内化为一种文化优越感,指出“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⑨时,却时以边缘化的且带有利己主义色彩的小事件作为佐证,形成内涵与外延的落差。在《烬余录》的开首,张果断地将这种落差合理化,“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⑩“不相干”无涉于民族大义,自然亦非关“正史”。“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⑪如此开宗明义,已为张的香港印象定下了基调,即宏漠的政治大格局之下的人生琐感。而这二者在张爱玲笔下的交接几乎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⑫“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⑬在死难者的身后,“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⑭对“大”的冷漠规避与对“小”的执著成就了张爱玲的香港镜像。

① 杨刚:《上海写给香港——孤岛通讯》,载倪墨炎选编:《浪淘沙: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5页。

② 其间,茅盾、叶灵凤、戴望舒、萧干、杨刚、陆浮、夏衍等分别在《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华商报》等主编副刊。同期出版的文艺性杂志有《大风》(陆丹林主编)、《时代文学》(端木蕻良主编)、《笔谈》(茅盾主编)等,参见刘蜀永:《香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③ 卢玮銮:《香港文踪: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53~133页。

④ 杨刚:《上海写给香港——孤岛通讯》,第428页。

⑤ 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载《张爱玲文集》卷2,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⑥ 张初来香港是1939年,1941年“港战”爆发返回上海,共计居港两年零三个月;1952年7月二度赴港;1955年8月赴美,1961年11月再次来港,1962年3月赴美,五六十年代居留香港共约三年半时间。参见罗卡:《张爱玲·香港·电影》,载黄德伟:《阅读张爱玲》,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1998年,第246~249页。

⑦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载张爱玲:《流言》,皇冠出版社1968年,第57页。

⑧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0页。

⑨ 张爱玲:《烬余录》,载张爱玲:《流言》,皇冠出版社1968年,第48页。

⑩ 张爱玲:《烬余录》,第41页。

⑪ 张爱玲:《烬余录》,第41页。

⑫ 张爱玲:《烬余录》,第48页。

⑬ 张爱玲:《烬余录》,第43页。

⑭ 张爱玲:《烬余录》,第51页。

被列入“张派”谱系而屡屡撰文与张划清界限的王安忆,在这一点上对张有所评议:“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无奈的虚无。”“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①虽则张爱玲有其“不要彻底”的名言作为人生观的“底”,然而在这种人生观的辐射之下,所呈现出的世俗的香港镜像,有如阔大的镜框中的玻璃碎片。这种印象是私我的,相对不完整的,更多是以个人体验作为尺度,香港与其说是上海的镜像,不如更可说是张爱玲本人的人生“他者”。

时值当代,当论述置换至以香港为书写主体一侧,“上海呈现”亦体现出作家的某种叙述策略。

黄碧云在短篇小说《丰盛与悲哀》“本事”一节开宗明义地写道:“我想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②,在文中,她更是借叙事者在上海的游踪,道出:“去了常德公寓。他们说是张爱玲的旧居……他们说张爱玲疯了。我想,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要活下去不容易。我只想站得很高很高的,写一个上海的故事。”^③如此,我们感觉到黄作为一个香港作家为上海这座城市建设文本的企图,而对张爱玲书写的挑战亦隐约其中。“为什么现在我们只愿意记忆张爱玲那个上海,那个有白俄钢琴教师咚咚教琴,有自来水有电车回厂的上海,而不得记得柔石、殷夫及其它二十四名革命者被杀害,令鲁迅两年后才痛定思痛、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的上海呢?”^④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这则关于上海的故事,出自于文中香港电影工作者摄制的一出剧作。黄借用一种文本段落间“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将城市间的对话关系复杂化。换言之,这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本身是出自摄像镜头之下,并不期然地承接了某种“香港凝视”(Hong Kong gaze)。

而这种凝视本身,在导演道出拍摄初衷“如何抵受历史与爱情的诱惑”^⑤时,也已经明确。上海在“香港凝视”下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本身的演绎方式一如分镜头剧本,呈现出跳跃型的切换状态: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后。在小说中,历史的更替和起落是匆促和迭进式的。而人只是在这种演进中无法自己的被动个体。“如果他开始理解历史,那是因为历史无处可躲。”^⑥当男女主人公终于在历史的最后一个时间坐标安定下来,“山穷水尽,宁静至此。”叙事人发出感喟:“上海的这一夜特别长。”^⑦以上的判断令人不由联想起“黄粱一梦”这一故事原型在叙事体系上对实虚空间关系的指涉。发生在上海的“本事”部份在现实层面香港电影人的关照之下,犹若一梦。作者在“开场”、“独白”等节借导演对演员的指令与提示将这种界线感进一步明确化:“哦,你们第一次见面?对对稿。你们年轻时在上海。”“你们看着黄昏的上海。景色和四十年前没两样^⑧。其实,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那不过是幻觉。由上海而生的幻觉。”^⑨

上海是导致“幻觉”的源头,“你们”(上海)与“我们”(香港)的世界之间壁垒分明。这其间的界限以历史作为标准与尺度。“上海不过是个城市。途经的经验不断重复。如果经验重复,一定是我的错(明明是一个传说中的历史城市。历史一去不还,我为何总觉似曾相识。)(那一定是我的错)”^⑩。在导演的独白中,中国近现代史成为这座城市存在的依据,也成为重构城市的基石。虽则主人公在渐入中年时自以为“历史的起起落落她不管。她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⑪而事实恰反讽地下了结论,她的命运一直而为历史所“管”。导演企图假历史之手,借“拍摄”这一行为,去掌控这座城市中所发生的故事。然而,在拍摄过程中,却无可避免地与现实层面的当代上海遭遇,而这个“上海”却因历史的脱落,泛化为一个空

①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载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②黄碧云:《丰盛与悲哀》,载黄碧云:《十二女色》,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25页。

③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27页。

④黄碧云:《繁花纷语录》,载《明报》2000年3月6日。

⑤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25页。

⑥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26页。

⑦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39页。

⑧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19页。

⑨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20页。

⑩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36页。

⑪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37页。

洞的文化符号：

工厂一样大的迪士高，在延安西路，刚开张没几个月。年轻人没有历史记忆，满满的都是欢容，在熟〔热〕汗中舞动，乍以为在纽约。可能都在文革后出生，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到南京东路买 Benetton 皮夹克的，会得说：这我们上海也有，那我们上海也有，最 trendy 的。明年我够十八岁，我也要美国去看看。OK？同性恋者又在角落耳语。美国青年留学生又夹杂其中，说着洋腔普通话^①。

我们看到，“现实”上海对于香港“主体”的表述而言，是缺乏意义的。因为它的“实”，难以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主体所需要建构的两座城市间的镜像联系。作者的清醒之处在于，其在小说中一再地强调对“像”的追寻，甚至将小说中的一节明确为“电影就是电影”。上海之“像”作为历史想象的“他者”存在，依赖主体而生，亦因主体而止。黄碧云对小说悲剧性的把握，在于小说结尾部分点睛式的收束之笔。因为男主角身患癌症，电影的拍摄戛然而止，令导演始料未及。

电影没有如他想象中般完成。电影以外又发生着可笑的事，似曾相识，但又在演绎出人意表。导演想，连人杜撰出的故事，也不能为人所掌握，更不说不为人知的命运了^②。

上海镜像因为现实的干扰而轰然崩溃，令作为观照者与建构者的香港无奈。我们看到，建构的难度在于小说文本中两个城市间存在的距离关乎时间与空间二维。而历史论述作为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无疑将这种距离感进一步拉大，以至难以设定城市间产生直接联系的媒介。李碧华在九十年代发表了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其中的主角单玉莲，可谓率先塑造了沪港之间的“游走者”形象。这一形象建基于同一时间脉络，对上海与香港进行表述。

此时的上海正值文革浪潮的席卷之下：

红卫兵又来了。

这已经是第二十七天。

“我们要‘破四旧，立四新’！”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

“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打倒牛鬼蛇神户！”

“文化大革命万岁！”

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眼睛，也见惯此等场面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們的斗争会如此惨烈？为什么这群哥哥姐姐一来，总是大肆破坏，见啥砸啥^③？

而香港如斯：

一上车，单玉莲便见车头玻璃上有个大大的“爽”字。是蚬壳汽油公司的标贴，这个“爽”字，便是她踏足香港的第一印象了。

她用力吸一口气。是车中茉莉香座的芬芳。

“香港真香。”^④

基于同一个观照者的感知，作者并未对上海与香港的城市性进行直接的描述。而是将这种感知具现为视觉与嗅觉层面，如“惨烈”、“爽”。这种感知是天真而具体的，同时也是意味强烈的。“香港真香。”无疑体现出叙事主体对于本土的认同感。我们看到的上海相对抽象，与历史附着下的“老上海”毫无关联，而是一个脱落了城市性的现代政治符码。主人公的游走，不期然地实现了两种意识形态间的流动。而相对地，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上海作家王安忆笔下对“游走”沪港两地行为的描述，则将更为明晰的政治烙印打在了对香港的书写中。小说《米尼》中，王安忆写道：

①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34页。

②黄碧云：《丰盛与悲哀》，第244页。

③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89年，第14~15页。

④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第58页。

哥哥十五岁,刚刚入团,爸爸妈妈是最早把去香港的决定告诉他的,这使他感到奇耻大辱。

在他思想里,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地方,父母一旦进去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①。

王安忆似乎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将张爱玲关乎上海/香港精致的对照关系解构了。拜时代所赐,政治话语轻轻地划出分野。香港包裹在意识形态的外壳之下,亦变身为社会主义上海的对立面——单调的差异化政治符号。单向注视的流动,简化为带着敌意的“看”与“被看”,同时失却了“看”本身的丰富内涵。然而,王安忆为两者之间留有了互动的余地——“去香港”。有意味的是,“去香港”作为《米尼》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及至篇末也并未实现,主人公米尼终于没有“去”得成香港。张爱玲小说营造出的沪港间的对照关系之所以成立,往往依赖于人物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事实,作为“看”的动作的延续;抑或是作为叙事者,以上海人的身份亲自书写香港经验。然而,王安忆却将“香港”实体化的可能性消灭了。

香港在文本中的虚幻性令上海主体的“看”只能依赖于想象而呈现,无法触及其实质。因为香港的“虚”,一种非常态的历史政治格局恰使二者之间的镜像关系明晰化了。

王安忆并未在此层面上止步,终于在另一部小说《香港的情与爱》中给予主人公一个“去香港”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去香港”这个动作在意义上的暗示——出路。在内陆与香港的交流史上,曾几次较大的规模的人口迁移^②。这几次迁移在香港的城市发展史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可谓深入人心,并演变成重要的文化主题。在香港导演关锦鹏的作品《长恨歌》中,我们可以发现关对王安忆的原作中情节饶有意味的改编,即蒋丽莉这个角色在解放前夕的人生归属。在小说文本中,蒋结识了一个地下党身份的导演,并“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③。而在电影版本中,蒋嫁作人妇,并随资产者家庭举家迁往香港(同类型的改编可见香港导演许鞍华对张爱玲作品《半生缘》中叔惠前途的处理)。我们自然可以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投奔”意象,内涵发生了具象的质变,由选择“革命”到“逃港”。姑且不论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为光明,而香港人对“去香港”作为上海人的“出路”的认同(这种观念在李碧华的《潘》文中亦有明晰的体现。),与其将之理解为香港进行主体重建的一种方式,毋宁说反证了香港作为上海镜像的存在——上海离弃“家城”,投向一个“像”自己的城市。

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主人公逢佳即以“投奔”香港的上海人的身份出现。值得关注的是,这是王安忆第一篇直接以香港为叙事背景的小说作品。而就作者本人而言,其从未如张爱玲等文学前辈有过较长时间旅居香港的经历。那么,作为一个过客的浮光掠影,她的“香港呈现”会不会掺杂入某种“上海成见”,的确可堪思索。

陈燕遐称其“选取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度(过客、新移民),却吊诡地从边缘以暧昧的中心心态统摄香港,在她的注视下,香港成为一个沉默的奇观。”^④然而需要重视的是,作者对笔下这个“新移民”的地位界定。主人公逢佳作为中年移民的上海女人,在性别与年龄上均居于劣势,而张爱玲苦心经营的“上海人”的优越感,在王安忆笔下亦轻易消解:“她属那种在上海被认为是江北人的类型,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⑤作为上海人的王安忆,为何写一个不典型的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此时“上海”的身份,意义何在,令人思索。当叙事触及逢佳的性格,我们却逐渐发现了她与王安忆所命名的香港之间出现了有

①王安忆:《米尼》,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②第一阶段是1946—1947年,正值中国大陆内战爆发初期,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人猛增到1947年的175万。1948与1949年,人口迁移的高潮才稍微减退。对于这次移民高潮的形成,估计与当时中国大陆经济萧条相关。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大陆解放初期。再一次触发了一次人口迁入高峰,1950年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18.6%。迁入香港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官员及其家眷,这批人中间的大部分陆续从香港转到台湾或者其它地区。50年代初,中国内地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触及相当一批人,也导致了1952—1955年间香港的迁入人口比较多,人口的迁移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1956年以后,随着这些运动的结束,这一迁移高潮逐步平息下去。第三个阶段是三年困难时期,内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大批内地居民进入香港,据称,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6万人进入香港。不过这些人并没从人口统计上反映出来。人口统计显示,1963和1964两年的人口迁移增长率的突然加大,既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果。第四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文革的影响同样在香港的人口迁移中表现出来。这一期间虽然中国内地陆续有人来到香港,但是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则明显降低。1966年香港人口的迁移增长率为-0.9%。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合法移民人数大幅度上升。1971年合法移民只有2530人,而1972年猛增到20355人。参见李若建:《中国大陆迁入香港的人口研究》,载《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2期,第29页。

③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④陈燕遐:《书写香港——王安忆、施叔青、西西的香港故事》,载陈燕遐:《反叛与对话——论西西的小说》,华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⑤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意味的交集。她的性情是“极端坦然与天真的”^①；而香港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就是雨。这就是香港人生的‘奇’中的‘真’。”^②而这种呼应性文字，文本中比比皆是。

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③。

香港真带有儿童气，还带有生命不长的紧迫感^④。

她(逢佳)对很多的事物，比如人生的目的，生活的含义，做人的道理，都有着以实利为基础的见解。由于她的真心意味和直率表达，便有了纯真的面貌，还更接近事情本质似的^⑤。

(香港的)人生是滤干了水分，实打实的人生，硬碰硬的人生。它的苦与乐全是真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它没有一丝委婉，供人作迂回躲避，它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⑥。

香港，以复写的方式化身逢佳这个上海个体的“他者”。然而作为个体，逢佳本人又是不够“上海”的。王安忆有意识地打破了某种关于地域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构建出沪港之间微妙的镜像关系。而这种联系，并非建基于张爱玲式的带有距离感的“俯视”，而是以相知与相濡以沫作为内核。

在文中，王安忆更籍逢佳一段自白对这种关联进行隐喻。

我这个人好像总是在被人家抛弃，被父亲抛弃一次还不够似的，再要被丈夫抛弃一次，第三次又不知道是被谁了…^⑦

有论者言及逢佳这段自白，曾直接将之与香港的处境对应：一直以来，“孤儿”、“无根”、“弃婴”都成为香港身份的形象词，她处于中英之间的政治位置，从来没有发言权，追溯身份，似乎都摆脱不了要再说“被遗弃”的历史……王安忆别有用心地安排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被抛弃的角色，目的不过是藉逢佳的口，去为香港说出她的命运^⑧。姑且不论这种政治隐喻是否确凿，然而，其中所包含的上海人/香港孤岛式身份的模拟性，却的确强调了前文所述的镜像关系。

逢佳的处境使其在契约式的权利关系中，只能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情与爱”并无法销蚀这种关系的功利性核心。其只能以一句“凭良心”作为自我保护的底线。“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凭‘爱’，不如说是凭‘良心’。”^⑨香港，则成为“良心”的试金石。

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指出：直至十年前，所有关于香港的故事都被写成是关于其它地方的故事^⑩。倪文尖则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了《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在1993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次年)：“上海”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像是顿时被意识到的“时代精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香港”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倪最后将这篇小说总结为“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上海梦’”^⑪。问题在于，依上述的思考模式，王安忆何以选取一个弱势的非典型的上海女人，作为指涉上海的文化符号。客观而言，无论是上海抑或香港，只是王安忆笔下的论述空间，或是“象征”。作者利用了其间内在相似的质地，通过一个上海人(叙事者/逢佳)的上海/香港叙事，实现了对人性的检阅。归根结底，王安忆构筑的是一座人性的城池。在篇末，叙事者借小说人物老魏之口，十分动情的一句：我爱香港。其实道出一名“过客”，对建基于概念的香港空间，乃至发生于其中的世俗传奇的认同与钟爱。

值得关注的是，在王安忆近年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中，出现了“老香港”的面目。张爱玲笔下的香

①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第506页。

②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载王安忆：《独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③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第506页。

④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第188页。

⑤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第506页。

⑥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第188页。

⑦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第548页。

⑧Peachy：《女作家笔下的殖民香港——论〈香港的情与爱〉与〈失城〉》，载 http://peachiestlife.blogspot.com/2006_05_01_peachiestlife_archive.html, 2006-06-02。

⑨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第556页。

⑩Ackbar Abbas. “The Last Emporium: Verse and Cultural Space”, *Positon* 1993(1), pp. 1~17.

⑪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第93页。

港,以闪回的形式出现在王安忆的写作中。着墨不多,却颇见几分“张腔”。虽则言辞上并不如张爱玲犀利,而“上海人”的观点却时有浮现。

那时节,香港在上海人的眼里,几近蛮荒之地,落后得很。如笑明明这样,只跑过外围小码头的人,以为除上海之外,都是乡下,就更把它想成不知道多么土俗的地方^①。

酒店的装潢非常豪华,广东人的富贵加上殖民国的古典风格,进出的男女毫不逊于上海的摩登。笑明明是从上海来的,晓得世界分三六九等^②。

此时的香港,其实是又一处卡萨布兰卡,各路流民汇入此地,再流向各处。但凡能走动逃离的人或是有钱,或是有脚力,在这中转客居的地方最合适做什么?做舞客。过客中上海人占不小的比例,所以,像笑明明这样的上海小姐,就顶受欢迎^③。

香港的所在,依然是为了印证上海经验。王安忆的“老香港”书写并未为这种镜像关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然而,当我们扩大“镜像”的外延,逆向思考,会发现香港作为他者,并非是沉默的。它所发出的声音,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近年来在文化界兴起的“老上海”风尚,不容忽视的份额归功于“香港制造”。香港“看”上海的动作,依然是两者间二元格局的延续。然而,这种审视的角度,并不能被完全定义为“香港”的,其中包含了一种对于上海的“忠诚”。

30年代后期以降,由于几次由沪至港的重要的人口流动与文化渗入,香港在潜移默化中“上海化”的过程几乎从未间断。由经济文化领域到社会生活,具体到城市景观中,大大小小的商户与食肆,不少都打上了上海的烙印。如此就不难理解,香港关于自身的文化记忆,有相当部分是“上海性”的。如李欧梵所言:“(在经济的疯狂增长之中),当香港把上海远远地抛在后面时,这个新的大都会并没有忘记老的;事实上,你能发觉香港对老上海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乡愁,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使之巩固(使之不遗忘)。”^④由此可见,香港人的上海怀旧,成为成份复杂的“精神还乡”,而对自我身份的困扰与对上海的致敬,也因此而模糊了界线。这种文化观望是情意结式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香港为上海持续不断地生产后者进行文化认同所需要的镜像。而饶有意味地是,这些镜像的品质往往比上海的自省所见更为直观与清晰。在这其中,最为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香港电影界近年来对老上海浓墨重彩的书写。

上海与香港之间的镜像关系,在种种强化与推演中,已内化为一种文化视野。理性地对待,将为两个城市的比较研究衍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一批香港本土的年轻文化人,以一本合集著作《上海——寻找上海的101个理由》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此书的序言中,编者特别提及了王安忆的散文《寻找上海》在香港对母土上海的异地观照。此书可称之为从写实层面与这篇散文的唱和,如编者所言:

回到一个城市的躬身反照,历时性的自身历史重省,固然有差异对照的价值在内。……书中的作者在调整角度(由香港看上海,或是由上海看香港,究竟可以有什么不同的刺激与反省);一方面在书写上海,同时也在书写其它的城市。对比、挪用、拼贴、复制等不同的城市思考,都在不同的文章中有所面对与处理^⑤。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一套阅读城市的方式,上海于我们而言,充满了流言与爱憎,所以这绝非长他人志气放弃香港的说法,而是不怕开拓视野,提醒我们要不断观察来警醒自己不足的自省^⑥。

●作者简介:葛亮,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善衡校园温仁才大楼11楼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王安忆:《桃之夭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②王安忆:《桃之夭夭》,第13页。

③王安忆:《桃之夭夭》,第17页。

④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44页。

⑤汤祯兆:《书写上海、香港以及其它的城市》,载李照兴:《上海101:寻找上海的101个理由》,知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8页。

⑥李照兴:《寻找一种新的旅游学——背叛香港还是反思香港》,载李照兴:《上海101:寻找上海的101个理由》,第10页。